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黄澄华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揭阳 522000)

【摘要】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关键词】裴子野;文人集团;梁武帝;理想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99-06

裴子野集团^①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集团的领袖人物裴子野是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深得梁武帝的宠信;大多数成员也得到皇室成员和社会名流的敬重。然而,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学集团,崇尚派的文学观点、文学趣味也给他们招惹不少的批评,特别是萧纲以皇太子的身份直接向崇尚派发出批评,在梁代中期的文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正如刘跃进先生在《中古文学文献学》中指出的:“裴子野与刘孝绰、王筠不同,既不攀附永明作家,也不见重于宫体诗人,因此在梁代文学前期和后期都不受重视,而在中期却深得梁武帝赏识而名重一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他的《雕虫论》猛烈地抨击了文坛‘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颓靡风气,也是针对永明以来轻靡之风而发的,他得不到永明作家和宫体诗人的理解和欢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1]p195}可见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的地位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之中。那么,这样一个私下结交的文人集团为何会深得梁武帝萧衍的宠信呢?

毫无疑问裴子野集团的大部分人都依附萧王室,与萧衍的关系特别好。像裴子野,萧衍深嘉他的博学多通的学识,操笔立就之文笔,和“廉白自居”的品性。自四十岁起用后,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中书舍人如故,一直留在皇帝的身边。裴子野死时,“武帝悼惜,为之流涕。赠散骑常侍,即日举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及子野特以令望见嘉,赐谥贞子。”^{[2]p867}可见梁武帝与裴子野的感情不一般。到溉可谓“特被高祖赏接”^{[3]p569}的人了,他身高八尺,美风仪,“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这种谨厚的性格与萧衍相似,故得高祖的“亲爱”。甚至于他生病后,“高祖每月三

置净馔”更见高祖对他的关爱之情,这在梁朝上下也是少有的。而谢征“幼聪慧”,高祖对谢征的感情也非同寻常。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去世后,要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将要颁发诏令时,“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征三人与议”^{[4]p718}。三人中,谢征年纪最轻,职位也不高,但高祖对他的任用恩宠都很厚重。当然谢征受此优待可能与他出身谢氏家族有关。父亲谢璟年少时与堂叔谢朓同样出名,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谢璟也在被招之列,也算是萧衍的西邸故交,感情自然也好些。而韦稜的父亲韦叡又是跟随高祖东征西战,建功立业之人。韦叡文武全才,才学比韦稜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史·韦叡传》中载:“叡每坐使稜说书,其所发擿,稜犹弗之逮。”^{[2]p1425}他“干国家,成功业”,天监十七年他回朝后,“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高祖甚礼敬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高祖对韦稜的感情也自是不一样。

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加倍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主张重学复礼,与高祖殊途同归

裴子野等人是一批才学之人,又是儒家思想的代表者,他们主张文学要恢复传统的“风雅”精神的文学观,深得梁武帝的支持。当然两者的出发点有些不同,一个是企图为文学指明创作的方向,一个是为了政治的稳定考虑,但两人殊途同归,都走到了回归儒学的路子上。

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中曾经指出“东晋南朝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门阀士族文化”。梁代依然是一个门阀社会,士庶之间的隔阂很深,梁武帝出于统治的需要,从尽量消除士

收稿日期:2010-06-03

作者简介:黄澄华(1979—),女,广东揭阳人,讲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庶之间的矛盾出发,重提重学复礼,企图以文化上的融合来促成政治上的融合。因而将南朝的文人集团放在一个士族门阀的大背景下进行人文观照,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虽然门阀制度走到了南朝已经渐趋衰亡了,但士族手中的文化优势却是强盛的,以至于统治者也不能忽视其存在,而只能采取安抚的政策才能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然而在重文的齐梁社会,高门士族自身的命运也在进行着历史性的转变,“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3]p49}南北士族都普遍完全成了自身的这种文化的转型,并凭着才学重新巩固了他们的傲人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来,社会上普遍引起一种很不好的趋势,就是庶族迫于现实的需要,刻意地模仿世族的行为,力争取得与士族同样的地位,却往往吃力不讨好。“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3]p22}面对这种社会现实,高祖萧衍认为,只有学礼才能去除现存的各种陋习,于是在天监八年五月壬午,下诏曰:“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3]p49}鼓励人们从学,学而优则仕。他把光大政治纲纪的重任放在儒学身上,而且给从学之人提供可能的求学进仕之路。他开辟学馆,承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即使出身寒门的有才之士,也可以“随才试吏”,量才录用,为寒士进入上层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于是“在上化下,草偃风从”,社会上形成一种学习的热潮。

当然,梁武帝提倡的“学”,应该是以儒学为主,特别是扎实的经史知识。要有高学问,自然要求勤学,于是好学勤学就成为学者的一种美德。实际上,萧衍自己即是勤学的榜样,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3]p96},加上才思敏捷,凡事能深入研究。他虽政务繁多,仍“卷不辍手”,借着烛光,读书至深夜,即使寒冬腊月,“执笔触寒,手为皲裂”还孜孜无怠。身为人君,还经常评论臣子们的文章才学,为他们解难答疑;身为人父,他对儿子们的教育和赏识,也是从学的角度出发的。如在梁天监九年(510)三月,他还亲自到国学讲习,并令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学受业。在萧衍的眼中,萧纲“六岁便属文”^{[3]p103},才气过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挥笔立成”,又是“文义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归美,率土宅心”之

人。如此的才德兼修,高祖对他宠爱有加,称叹他为“此子,吾家之东阿”,并不顾一切反对地把皇位传给了他。萧衍的博学多能,当时反响是“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梁书》记载中人物皆因博学为重,因才学过人而受赏识,与萧衍的推崇与倡导是不无关系的。而裴子野等人能得以长期留在萧衍身边,与他们的才学也有必然联系的。而且,裴氏集团成员能走到一起的首要条件也是重学问,“博极群书”。当然,裴子野中的大多数人注重学识首先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而更多地是出自于社会的风气、家学渊源和个人的才学品性。如裴氏家族是史学大家,顾氏家族与谢氏家族也都赫赫有名,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后代子孙的知识培养,从小要求他们读书习礼,从而保持住他们高门士族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强宗的资格。另外,个人的好学习品性更是他们对学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的内在原因了。

二 儒释兼容,以孝为本,清白自守

萧衍倡孝行重节俭,裴子野等人更是孝俭的典范。他们都以孝为本,清白自守,把儒家“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思想与佛家的随缘自适的思想很好合二为一,作为指导自己行为实践的准则。因此裴子野行为与萧衍的思想的一致性,使他渐渐成为武帝心中理想文人学者的典型代表。

首先是重孝。南朝人重孝行,“至孝”被视为人最好的品德。萧衍“生知淳孝”,六岁时,献皇太后逝世,他“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后来文皇帝去世时,他伤心到“销毁骨立,亲表士友,不复识焉”的地步。登上皇位后,他也常为天下苍生而“涕泗滂沱、哀恻左右”,这时的“孝”主要表现为君主的大孝。萧纲“在穆贵嫔忧,哀毁骨立,昼夜号泣不绝声,所坐之席,沾湿尽烂”。虽同样是至孝之人,在这里表现为对父母的孝,是小孝。但无论大孝小孝,都可见出南朝自上而下的重孝之风。

裴子野集团中人也都是重孝之人。《梁书·裴子野传》载:“子野生而偏孤,为祖母所养,年九岁,祖母亡,泣血哀恻,家人异之。”^{[3]p441}“遭父忧去职。居丧尽礼,每之墓所,哭泣处草为之枯,有白兔驯扰其侧。”裴子野的这种让草木为之枯萎,动物为之伤感的孝,同样受到范缜、徐勉等当时高官名人的称道。阮孝绪“幼至孝”^{[3]p739},有一次他在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他至性冥通,突感心惊而还。并用他的至孝行为感动上天,使神鹿引路而寻得治病的人参草,治愈了母亲的疾病。故事虽带有神话色彩,也同样说明至孝之人为社会所称道。萧勣也

是至孝之人,“母忧去职,殆不胜丧。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风雨,仆卧中路,坐地号恸,起而复前,家人不能禁”^{[12]p1262}。父萧景“薨于郢镇,或以路远,秘其凶问,以疾渐为辞。勸乃奔波,届于江夏,不进水浆者七日。庐于墓所,亲友隔绝”。因为至孝,裴子野、萧勸、阮孝绪等在当时都赢得到名流的推赏而声名远播,甚至还得到朝廷的嘉奖。如到溉,“遭母忧,居丧尽礼,朝廷嘉之”^{[13]p568}。在梁代的律例中,尽管梁武帝时期的刑律是较轻的,“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15]p695},“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对公卿大臣犯罪,总是有意地网开一面,以劝戒为主。但偏偏对“不孝”之人要加以重罚,“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并且这一刑罚一直延续到陈、隋。

实际上讲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道德精髓所在,孝强调的是“求诸于自”。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16]p95}。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一指向,规定文人主要任务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17]p130}有博洽的学识固然重要,但修身也是必不可少的。《南史》中史官论曰:“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21]p1851}可见,自汉以来,修身不仅是个人的修为问题,在忠孝成俗的南朝社会,它更是为社会广泛认可的为人的标尺。阮孝绪的外甥谢蔺才五岁,“每父母未饭,乳媪欲令蔺先饭,蔺曰:‘既不觉饥。’强食终不进”^{[13]p658}。阮孝绪听后,叹曰:“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事君则蔺生之匹”,是“吾家阳元也”。曾子、蔺相如正是忠孝的典型,以此作比,对忠孝的推崇就一目了然了,而对忠孝之人的喜爱之情也溢于言表。裴子野他们重孝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他与萧衍有某种相同的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他们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正统。

其次,在讲究“孝”的同时,梁武帝还提倡节俭。萧衍未登帝位之前,就已经认识到永元失德的严重后果。由于“上慢下暴,淫侈竞驰”^{[13]p15},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甲第康衢,渐臺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筏冰之家”,无论是贵族或民平,都“骄艳竞爽,夸丽相高”,竟到了“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缣绣是裘”的地步。所以他提出“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要求去掉浮华雕饰之俗使之重返质朴。他下令如果不是用来供奉祭祀的穀物,修饰官服的礼服,学习礼乐的制,整治兵器武备的其他一切花费,一律禁绝。并从自己开始,要求“群

才并轨,九官咸事”,九卿六部的官员,都能省察约束自己,务求俭朴奉公,这样才能有效地移风易俗。

在梁武帝的推崇下,节俭更成为一种规范制度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裴子野等人的节俭更是到了让人敬佩的地步。“清白”“淡然”是裴子野集团中人共有的评价之一,这完全符合梁武帝心中的理想的文职官员标准。那么,萧衍心中理想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是什么呢?

首要就是绝对的忠诚。梁武帝的帝王尊严,需要的是臣子们的敬重与仰慕,任何有损他威严的地方都是不允许的,这由他和沈约交往的态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中可以看出。早年他与沈约只是诗友之交,友好而无拘无束。到高祖起兵之时,沈约就相中他有过人的才能,于是第一个主动请萧衍登基称帝,成为高祖成就帝业的两位大功臣之一。可萧衍登基之后,与高祖有如此交情的沈约以为能有所作为了,多次上表表达自己的意愿,武帝却毫不理会。这让沈约深受打击,郁郁寡欢,放任自流。沈约之死表面上是因为惧怕高祖对他的多次不敬行为要追加惩治而自己吓死自己的,但实际上从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看应该是梁武帝对像沈约这样的文人长期不满的结果。在他心中,“怀情不尽曰隐”^{[13]p232},可见萧衍对沈约的不能容忍。究其原因,可能三个:一是沈约历仕三朝,对故国故友怀有深情的态度让萧衍不满;一是两人对文学趣味不同,又都争强好胜,常闹矛盾。三是梁武帝只把沈约当作是文学之士,就像他曾对庾肩吾所说的:“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18]p424}而殷不害正是“长于政事,兼饰以儒术”之人。由此可见,在梁武帝心中,静默自守才是文人本色,这也许也是梁代大多近在武帝身边的人都无所请谒的原因吧。

在这样的帝王身边,有了绝对的忠诚之外,其次就是淡泊无求的德行,这一点与裴子野等人的性格又有些不谋而合了。像顾协自小就有“枕石漱流”之志,年近六十时,湘东王上表举荐他说:“臣欲言于官人,申其屈滞,协必苦执贞退,立志难夺。”^{[18]p446}对仕途名利的淡泊到了这种地步。后来任中书舍人,“时左右之任,多参权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唯荔与顾协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当时号为清白”。^{[13]p256}近在皇帝身边却“泊然静退”,“廉白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闼,内外称善”。终身布衣蔬食,性格倔强,无论是出于何种心态的馈赠,他坚决不受,最典型的是棒打送礼人,“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

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2]p1519},成为文学史上一大美谈。

其他如到溉“美风仪,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3]p568}。萧勣更是以实际行动体现其清白为人,他为广州刺史时,“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广州近海,常有海暴走私,也多贪官,“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而“自勣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所得财物,都上交或分发与人,从不中饱私囊,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2]p1262}

裴子野更是以“廉白自居”,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代表。年少时就“常欲继成先业”,看到沈约的《宋书》叙事有不实之处,不畏权威,有意显胜,著《宋略》,以实录为本,一下子赢得沈约、范缜的敬重,“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扬镳”,看重的就是他的实实在在的为人和敢于质疑的勇力、言辞犀利的能力。范缜是齐梁间儒学思想的坚定守护者,虽两人没有见过面,却在天监七年上表让国子博士给裴子野,这其中的原因相对复杂些,但林田慎之助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范缜在永明中就与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要好了。《南史·范缜传》中载:“永明中,与魏氏和亲,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琊颜幼明、何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2]p1420}“也许就是因了这样一层关系,范缜得以了解到他过去的僚友之遗孀的著作及其为人的吧。”^[9]另一原因是范缜为他自己的学说选继承人。他认为那个引起任昉不满,又在《宋略》中指摘沈约《宋书》的谬误的裴子野的叛逆精神,是他用来对付当时佛教统治的最后抗议行动。“不难想象,即使他只是个无名的历史家,但在以事业为念的范缜眼里,为了对付梁朝政治上、思想上的危机,他是个必要和重要的存在。”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也与裴子野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历史责任心的学者有关系。范缜的判断是准确的,在裴子野的思想深处,出仕从而有一番作为是他的一种理想。天监初年,裴子野就开始了他的求仕之路,与当时的安成王萧秀交好,“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古未之有也”^{[3]p345}。在普通二年(521)张缵累迁太尉谏议参军,尚书吏部郎,俄为长史兼侍中之时。当时因为张缵只有二十三岁,“时人以为早达”。而河东裴子野曰:“张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3]p493}由此也可看出,裴子野思想深处有着厚重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作为有学问有才华的年轻人,有“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可

惜自己大器晚成,四十岁才开始腾达。但之前即使是出任诸暨令这样的小职之时,他也秉承儒家的“仁政”思想来治理,“在县不行鞭笞,民有争者,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并不因为小职而轻忽。由《宋略》现存的篇章中,我们看到裴子野是以儒家传统思想观照整个社会,对政治、文学等各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尖锐的批判,带有正统学者的一身正气,而这足以证明,裴子野并非生而甘心寂寞之人。

但另一方面,裴子野也不走趋贵求富之路,在未有机会展示自己才学之时,他就坚守“独善”原则,“栖迟下位,身贱名微,而性不憚憚,情无汲汲,是以有识嗟推,州闾叹服”。他作为任昉的姻亲,在任昉如日中天、名高一时之际,却拒绝登门拜访,“昉亦恨焉”。但他并不反对范缜对的赏识与举荐,他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信,而且对人生的得失也从不争辩什么,对仕途的浮沉看得很开。如有一次三官通署狱牒,裴子野不在,同僚们不明情由就署他的名,因此被免职。有人劝他说去向上司求情,可以无事,但他却笑着说:“虽惭柳季之道,岂因讼以受服。”因这件事免黜很久,却终无恨意。这种刚直、洒脱的性格,难怪中书范缜与他未遇时,闻其行业而善焉,称赞他“幼禀至人之行,长厉国士之风”。后来作为中书舍人,近在皇帝身边,裴子野却身居陋室,静默自守十几年,从未有过任何的抱怨。他的“劬劳通事”与忠孝思想,是梁武帝看重的地方。

实际上,像裴子野、顾协、韦稜这样的人,因为性格的原因,自觉不自觉地就和当局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本来就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加上梁武帝对文人参政存有偏见,就算无所作为是一种现实政治下的无奈,他们也只有默默的承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书舍人虽近在帝王身边,并不意味着就大权在手了,他们也像沈约、庾肩吾一样只被当作文学之士,并未拥有实权,故而从未见他们在政治上有何大作为。于是就与萧衍成了一种貌似无间,实则相离的关系。

加上萧衍晚年信佛,带头信奉佛教,全国上下兴起一股学佛热潮,佛道思想也随之渗透到许多原来奉儒的学者文士中去。后来萧衍提出三教同源的思想,于是思想界大致都呈现出儒释道相交融的局面。裴子野晚年也深信释氏,终身饭麦食蔬。佛学随缘自适的思想也引导着他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得失之间显得更洒脱,是文士与高官的完美调和,高傲地生活着。这些都不能说与萧衍的思想中

对文人的要求无关。裴子野能很好地处理儒释道之间的关系,显得很圆融。追求学问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失去时也不为之过分的伤心;与皇室各成员交好,却从不仗此自得,反而谨守自居;深受社会名流的器重,却从不攀附,也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他们不愿做的事。游动于儒佛道思想之间,又将之相互融合,从而使他既身处官场,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最终得以全身保命。在这一点上,裴子野集团中有些人做到了,但有些也没能做到,像刘显、刘之遴。他们心中高唱的建功立业思想也遭到如沈约一样待遇,下场甚至更惨于沈约。顾协、萧勣也是能文能武,在治理国家方面有独到之处,可在梁武帝不加重用,他们也过着平平静静。由此可见,即使处在梁武帝统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国家也趋于上升时期,在用人方面同样存在未能真正任人唯贤的不足。最终梁代文学的一时繁荣并不能保证政治的长期繁荣,甚至于起了反面作用,加速了它的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 文学主张与创作倾向相近

萧衍“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虽不免有言过其实,但由史书的记载关于他的著录情况来看,至少他都是涉及其中的。南朝是重学术的时代,这与梁武帝自己带头创作不无关系,周易、尚书、礼记、毛诗都有他的义疏。但实际上,这种由上而下的学术热潮正好说明了当时的学术已经衰弱了,它没有一个像两汉的经学或者魏晋玄学那样相对稳固的学术指导思想。

而自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于京师开儒、玄、史、文四馆,各自聚徒授业,正说明了传统儒家的失尊。梁武帝有心提倡国学,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朔,下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3]p41}并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招文学才士。但在当时能精通一经之人仍是极其少见的,于是才有才优之人特别照顾的优待政策,可以不限年龄而直接选为国子生。如周弘正,“年十岁,通老子、周易”,“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易,诸生传习其义”,对此博士到诰说:“周郎弱冠讲经,岂俟策试?”^{[8]p305}可见其难能可贵。

梁武帝大力提倡国学是为他的统治服务的,而他所主张诗歌应该是雅正的,也同样是从更好的淳风俗的目的出发的,这从他对沈约的《四声谱》的态度就可知道。《梁书·沈约传》中载:“又撰《四声谱》,

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3]p232}萧衍不识声韵,也不重四声,对宫体诗的创作更是极力排斥,《梁书·徐摛传》中载:“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史及百家杂说,未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3]p447}从对徐摛态度的变化中,可见梁武帝对人才的要求。而他否定宫体创作的态度与裴子野他们何其相同。《梁书·萧子云传》中记载,梁初,郊庙未革牲牲,所有乐辞都是沈约所撰,后来萧子云认为不好,于是提议修改,理由就是“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3]p514}。而“约之所撰,弥复浅杂”。梁武帝最终采纳他的建议,下敕修改原有的乐辞:“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后来萧子云修改后采用的乐辞就是“惟用《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即是经诰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寻唐、虞诸书,殷《颂》、周《雅》,称美是一,而复各述时事”,高祖敕并施用。这样一来,所谓的文学歌辞风格与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批评的文风何其相似。这说明,萧衍所提倡的文风实际上就是裴子野等人创作的文风^②,而深入一层地看,萧纲批评师裴一派的创作,似乎带有暗地里批评萧衍的主张的味道了,父子俩的文学创作观念不同也可见一斑了。

除了文学趣味相同外,裴子野等人也常常围绕在梁武帝身边进行文学活动,如起草各种诏敕文、奏章、修书等文学活动。《梁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鍾岫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3]p713}顾协奉命参加编撰《遍略》,裴子野又被敕撰《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和始草创未完成的《齐梁春秋》。或者直接参加一些诗文创活动,如谢征,“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又为临汝侯渊猷制《放生文》,亦见赏于世。”^{[3]p718}

当然,这里面不乏讨皇帝欢心而进行创作的成份,如《梁书·刘之遴传》中记载:“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武帝义疏,唯《左氏传》尚阙,之遴乃着《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

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3]574}刘之遴注《左氏传》就有这种讨好的因素在了。但总的说,裴氏集团的许多文学活动主要是围绕帝王展开,有点缀政治升平的意味,也是逞才斗智的方式之一。

总之,裴子野集团中人依附在梁武帝身边因为他们的许多观念与武帝相符合,因而得到武帝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裴氏集团中人,大都是学识过人而心胸旷达之士,他们以学

问相善,在政治上无所求,固守着自己的一套理念,不随波逐流,淡泊处世。他们身居高位,却过着简陋贫困生活;在骄奢淫逸成为社会风气的南朝社会,他们保持自身的高洁。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却并不以此自骄,反而静默自守,从来不讲究个人的得失。正是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关于裴子野集团的成员、存在时间、文学主张等方面可参见拙文:《浅析裴子野文人集团的形成基础》《浅析裴子野文人集团“尚质”的创作情况》。
- ②裴子野他们“尚质”的创作内容与其质朴典雅的创作风格与萧衍相同。
- [1]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2][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4]刘跃进.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A],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5][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6]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A].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 [8][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9]林田慎之助.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关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A].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辑)[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ei Ziye Group and Emperor Liang Wudi

HUANG Cheng-hua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Jieyang Occupational Institute, Jieyang, Guangdong 522000)

Abstract: Although the Pei Ziye group wasn't a political group, it had thousands of relations with the highest ruler of the Liang Dynasty. Apart from those of being friendly and old friends, the members of the Pei Ziye group drew much attention of Emperor Liang Wudi. The main reasons are that these people were very similar in many respects to those ideal literati in Emperor Liang Wudi's mind, who claimed that the Confucianism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restored, and emphases should be laid on the quality but not the literary grace. In the meantime, their historic works and moral qualities helped them fi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were complimented by many well-known persons and they became the models of the ideal literati in Emperor Liang Wudi's mind.

Key words: Pei Ziye; Literary Group; Emperor Liang Wudi; Ideal Character

(责任编辑:李进)